

在寫本與印本之間的方書 ——宋代《千金方》的書籍史

陳昊*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

本文以現存《千金方》早期傳本與出土文獻中的《千金方》印本殘葉為基本材料，嘗試觀察作為書籍的《千金方》在這個時代的歷史，並期待能以之為例，揭示出醫學知識及其物質載體在此時代的多樣圖景。書籍及其刊刻在宋代醫學變化的敘述中，扮演著一個重要的中介位置，它連接其了北宋前期朝廷對醫學的重視與之後的士人習醫風氣，也被認為是推動醫學知識群體身份變化的動力之一。本文試圖以《千金方》為例展示如何在一種更為複雜的敘述中重新思考校正醫書局、刊印書籍與同時代寫本在當時知識地圖內的意義。

關鍵字：方書、寫本、印本、書籍史

一、引言：“毀譽參半”的宋代校正醫書局

宋代被看作中國醫學史中重要的變化時期，對於此時期醫學變化的敘述中，要點有二，一是醫學群體身份的變革，二是醫學知識的傳遞形式及其權威的變化，也就是所謂“醫書”的變化。後者最重要的史實依據就是校正醫書局，近來的研究亦對此有所關注，比如郭志松（Asaf Goldschmidt）先生將北宋前四朝看作 11 世紀醫學變革的關鍵，也就是到宋仁宗朝，醫學知識發生了關鍵的變化。這一判斷的依據，顯然也與校正醫書局在宋仁宗朝的建立有密切的關係¹。

《玉海》卷六三“天聖校定《內經》、《素問》”條記：“（天聖四年<1026>）十一月十二日，命集賢院校理晁宗愨、王舉正校正《黃帝內經素問》、《難經》、巢氏《病源候論》。五年四月乙未，命國子監摹印刊行。”²之後又記，宋仁宗嘉祐年

間（1056-1063），韓琦上言，認為重要的醫學書籍“《靈樞》、《太素》、《甲乙經》、《廣濟經》、《千金》、《外台秘要方》之類多訛舛，《本草》編載尚有所亡”，要求重新校勘修正。同年八月，仁宗下詔在編修院內專設“校正醫書局”。此活動對醫學傳佈的影響，宋人陳振孫就有表彰，《直齋書錄解題》言：“大凡醫書之行於世，皆仁廟朝所校定也。”³現代學者也承襲其說，《中國科學技術史·醫學卷》言：“在手抄本轉為版刻的歷史關鍵時刻，北宋政府利用國家的力量，將許多重要的中醫典籍刊為定本，這在中醫發展史上是有歷程碑意義的。”⁴此評價中包含了幾個基本的因素，一是此時間是寫本向印本過渡的關鍵時期，由於書籍製作技術的進步產生了醫學書籍的“定本”；二，此定本的建立是通過國家力量收集醫學書籍，並由儒臣的校勘完成的。印刷術對醫籍的影響，在民國時已為學者注意：“中國經籍之傳世

* 聯絡人：陳昊，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北京市海澱區中關村大街 59 號，電子郵件信箱：petercc@163.com

者，至宋始多，蓋鈔板之術盛於是時使然。然醫家之書，經宋人搜輯傳世者，醫經類甚少，同一經方也，本草類亦甚少，而方書獨多。”⁵田曉菲嘗言：“北宋的學者、編者、校勘者，繼承了唐代手抄本文化巨大、分散、混亂的遺產。也許，正因為印刷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人們有史以來第一次對手抄本之間的差異產生了強烈的關懷。這告訴我們，物質文化和技術的發展會反過來影響人們感受認識世界的方式。”⁶

但如果回到宋人對此變化的敘述語境之中，他們顯然並不認為醫籍中“文注分錯”的局面是因為手抄本向印本轉化的過程造成的，他們對此有自己的理解方式。高保衡和林億（或為“億”）在其校正《素問》的序言中解釋：“惜乎唐令列之醫學，付之執技之流，而薦紳先生罕言之，去聖已遠，其術晦昧，是以文注紛錯，義理混淆。殊不知三墳之餘，帝王之高致，聖賢之能事。……奈何以至精至微之道，傳之以至下至淺之人，其不廢絕，為已幸矣。”⁷醫術已不是“伎術”之流，那其經典的解釋權自然其也不應該歸於“執技之流”而應歸於儒者。這樣一種敘述的話語，恰好揭示了時人敘述與現代學術觀察之間的差異，並非是由寫本繁多並向印本轉化而造成了紛雜的狀況，而是由於醫學知識掌握在不恰當的人手中。在此敘述背後有著重要的潛臺詞，即，開創治世需要回到古代聖王與他們的臣子的狀態，由他們治理國家同時也掌握著各項與民生相關的知識與技術。

但這種學術態度及其成果，在另一些學者的眼中卻背離了書籍的“原貌”與作者的“本意”。宋人莊綽在《雞肋篇》中稱：“孫真人《備急千金方》‘大醫精誠’篇云：‘自古名賢治病，多用生命以濟危急，雖曰賤畜貴人，至於愛命，人畜一也。損彼益己，物情同患。夫殺生求生，去生更遠。……’而《新校正》治婦人妊娠諸方，皆用烏雞之類，割頸取血以煎藥，乃高保衡、孫

奇、林億以《崔氏纂要》等方所增加，不特失真人之用心，又慮後世疑不用生命以為虛語。”⁸其中已以為《新校正》失去孫思邈之真意。現代中醫文獻學的研究者也對其校勘的方式頗有微詞，黃龍祥先生曾激烈的批評宋代校改醫書的弊端：“其實，宋人這種輕易改書的弊端在醫書的整理上也表現得十分突出，由於未經宋人整理的古醫書極少流傳下來，故人們對於宋人私改醫書的作法以及這種做法給古醫籍所造成的危害都缺乏足夠的認識，以致于在古醫籍的研究中遇到許多困惑而不得其解，甚至出現許多失誤而不自知。”⁹黃先生批評有一個重要依據，即現存在日本靜嘉堂的黃丕烈舊藏《孫真人千金方》與宋臣校正本的不同之處，說明宋人對孫思邈“原書”進行了大量的改動。

以醫學書籍的文獻學意義作為價值判斷爭論之基礎，實際並無助於理解醫學書籍在過去某個時期流傳的實態，也難以釐清印刷技術與醫學書籍流傳、醫學知識之間的互動關係。直到最近，范家偉先生才系統清理了校正醫書局的相關史事，提供了一個更為切近的歷史圖景¹⁰。同時，對於宋代校正醫書所造成的社會後果，無論是稱頌者，還是批評者，其隱含的預設，都是認為印刷技術完全改變了這個時期醫學以及其他知識的面貌，這一論點近來也遭遇質疑¹¹。本文以現存《千金方》早期傳本與出土文獻中的《千金方》印本殘葉為基本材料，嘗試觀察作為書籍的《千金方》在這個時代的歷史，並期待能以之為例，揭示出醫學知識及其物質載體在此時代的多樣圖景。

二、國家刊印書籍與醫學知識的傳遞——以宋校正醫書局刊本《千金要方》為中心

景祐年間韓琦上奏要求勘定的醫書，其中就包括《千金方》。宋本《孫真人備急千金要方》

卷末附刊記：“治平三年（1066）正月二十五日進呈訖，至四月二十六日奉聖旨鑄版施行。”¹²可知其校正完成後很快進行刊刻。現藏米澤市立博物館的宋刻本，可能是現存最早的醫書局本，此書每半葉有界十一行，行二十三字。白口，間有小黑口，版心題“千金方（卷數）”或“千金要方（卷數）”，並記字數、干支、葉數、刻工姓名。曾為金澤文庫舊藏。江戶醫學館在日本孝明天皇嘉永元年（1848）將此本重新影印，當時此本被認為就是北宋官校原本。宮下三郎先生指出此書應是在紹興十年（1147）刊刻，宋光宗時期（1194-1200）的補刊本¹³。嚴紹盪先生認為：“卷中凡版心記干支之各卷，大體皆在‘丙寅’與‘丁卯’，即宋高宗紹興十六年、十七年（1146-1147）。此各卷之避諱缺筆，皆宋仁宗之諱。文字寬裕，欄界闊大。此即宋紹興年間覆刊宋治平年間之本。補刊部分版心記字數，欄界略窄，文字稍為緊小。此各卷中避諱至宋孝宗，當為紹熙、慶元間（1190-1200）補刊。”¹⁴現藏宮內廳書陵部的元建安刊本《千金方》，其《目錄》尾題之前有唐草識語，其中言：“近得前宋西蜀經進官

本，不敢私秘，重加校正一新，繡梓與世共之。”¹⁵由此可知北宋的醫書局本在宋元曾有歷次刊印。

北宋醫書局校勘醫書原則記載於其文中：“臣等術謝多通，職專典校，於是請內府之秘書，探道藏之別錄，公私眾本，搜訪幾遍。得以正其訛謬，補其遺佚。文之重復者削之，事之不倫者緝之，編次類聚，期月功至。綱領雖有所立，文義猶或疑阻，是用端本以正末，如《素問》、《九墟》、《靈樞》、《甲乙》、《太素》、《巢源》、諸家《本草》，前古《脈書》，《金匱》、《玉函》，《肘後備急》，謝士秦《刪繁方》，劉涓子《鬼遺論》之類。事關所出，無不研核，尚有所闕，而又泝流以討源，如《五鑿經》，《千金翼》，《崔氏纂要》，《延年秘錄》，《正元廣利》，《外台秘要》，《兵部手集》，《夢得傳信》之類。凡所派別，無不考理，互相質正，反復稽三，然後遺文疑義，煥然悉明。”¹⁶按照曾鳳根據《備急千金要方》與《新雕孫真人千金方》、《真本千金方》以及《外台秘要》、《醫心方》引文的對比研究，校正時調整了卷次、卷題、篇次、篇題、方論順序、方劑順序、藥味順序、主治的敘

表一 《千金方》諸版本卷一篇次篇題比較

宋醫書局本《備急千金要方》	《新雕孫真人千金方》	《真本千金方》	《道藏》本
序例	序	序	
大醫習業第一	習業第一	大醫習業第一	論大醫習業第一
大醫精誠第二	精誠第二	大醫精誠第二	論大醫精誠第二
治病略例第三	理病第三	治病略例第三	論治病略例第三
診候第四	診候第四	診候第四	論診候第四
處方第五	處方第五	處方第五	論處方第五
用藥第六	用藥第六	用藥第六	論用藥第六
合和第七	合和法第七	合和法第七	論合和第七
服餌第八	服餌法第八	服餌法第八	論服餌第八
藥藏第九			論藥藏第九

述方式、藥量、用藥單位，還增補了大量內容，但很少妄刪¹⁷（例證見表一）。這種以較為嚴整的體例來整理方書，可能並不是僅僅針對《千金方》，對《外臺秘要》等書也是如此，此舉試圖以嚴整的形態突出方書的“書的特徵”，使之區別於中古方書為方論匯抄的存在形態。

但這種整理的取向能否改變當時醫學知識的整體面貌呢？試圖討論校正醫書局勘定的《千金方》等唐代方書所造成的知識變化和影響，需先考察其所獲得的流通範圍和閱讀群體。要回答這個問題，可先嘗試將其與宋代政府編纂並頒下的方書（太平聖惠方）對比？在宋代官方編纂下頒的《聖惠方》等醫方書中實際已經包括了《千金方》中相關的藥方¹⁸。如果內容有所重複，兩者是否在功能上有所區別？其在向地方流布的途徑是否有所不同？在頒佈《太平聖惠方》的詔令中稱：“《聖惠方》並目錄共一百一卷，應道州府各賜二本，仍本州選醫術優長、治疾有效者一人，給牒補充醫博士，令專掌之。吏民願傳寫者並聽。”¹⁹可見此類醫方的印刷和下頒是以重建地方醫政為目的。但校正醫書局校定醫學書籍的背景已與《太平聖惠方》略有差異，宋仁宗朝開始重興醫學的努力，強調講授醫學經典的價值，勘定《千金方》的目的，在林億等人的序言中稱：“書雖是舊，用之惟新，可以濟函靈，俾乃聖好生之治；可以傳不朽，副上主廣愛之心。非徒為太平之文致，可佐皇極之錫福。校讎既成，繕寫伊始，恭以上進，庶備親覽。”²⁰因此刊刻《千金方》的意義在於定正本之後建立權威性知識的意義。刊刻之後對其進一步傳遞和使用的期待也與之前《聖惠方》有所差異，通過習醫之人獲得恰當的知識，進而提供給地方的民衆以醫療服務，而不是期待民衆自身傳寫醫療知識。

這種期待要得以實現，首先還是需要依靠宋代政府所擁有的知識傳遞渠道，即地方醫政和醫學教育。仁宗朝及其之後任地方官員的士人都看

重醫學書籍在地方行政中的作用。只是在他們的醫政實踐中，可能對書籍使用者並沒有明顯的差異。在《聖惠選方序》記載此書的由來，是蔡襄在福建為地方官時，發現頒給各州郡的《太平聖惠方》，“州郡承之，大率嚴管鑰謹曝涼而已，吏民莫得其利焉”，其郡人何希彭從《太平聖惠方》選方編為《聖惠選方》（1064），蔡襄“因取其本，騰載於版，列牙（衙）門之左右。”²¹明隆慶六年（1572）王守中的《刻千金寶要序》記此書由來：“《千金寶要》者，宋徽猷閣直學士郭思，按唐孫真人先生所集《千金方》中纂要者也。宣和六年（1124），思刻石於華州公署。”²²此郭思即宋代畫家郭熙之子，《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三八記：“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郭思致仕，思，河陽人，父熙為翰林院待詔以畫山水名。思，登進士第，中歷帥三路，至是渡江而卒。”²³《宣和畫譜》記：“（郭）熙雖以畫自業，然能教其子思以儒學起家，今為中奉大夫管勾成都府蘭、湟、秦、鳳等州茶事，兼提舉陝西等買馬監牧公事，亦深於論畫，但不能以此自名。”²⁴其刻石華州很可能就是提舉陝西等買馬監牧公事期間，由於郭思對《千金方》進行了編纂²⁵，因此無法知道《千金寶要》的內容是否來自宋醫書局的《備急千金要方》（可見表二中的文字對比）。

這意味著作為地方官員的士人在醫療行政中都不一定會選擇中央政府刊刻和下頒的醫學書籍，這取決於中央的醫書資源是否易得，以及所在地方提供的醫療資源。當然其中對醫學知識有興趣者，會將自身閱讀的醫書變成一種地方醫政的資源。於是，個人的閱讀興趣與地方醫政被聯係起來。個人的閱讀興趣顯然會受到官方醫書刊刻的影響，我們可以發現任地方官者閱讀或在自己的著作中引用校正醫書局本《千金方》，比如劉昉在編撰《幼幼新書》時抄錄《千金方》很可能是來自校正醫書局本²⁶。但並不代表他們接受

表二 《千金寶要》與《備急千金要方》、《新雕孫真人千金方》的文字對比

宋醫書局本《備急千金要方》	《新雕孫真人千金方》	《千金寶要》
治女子漏下，積年不斷困篤方，取鵲重巢柴燒灰作末。服方寸匕，日三服，三十日愈，甚良。重巢者，鵲去年在巢中產，今年又在上作重巢產者是也。	療女人漏下，積年不斷困篤方：取鵲巢，柴燒作灰，飲服方寸匕，日三服，三十日治癒。鵲去年作巢產，今年又在上作重巢產者是也。	漏下，積年困篤者，取鵲重巢，燒灰，末之，服方寸匕，日三服，三十日愈，重巢者，連二年鵲產其上者是。

其校正文本的權威性，“知進賢縣”程迥在《醫經正本書》中批評校正醫書局本《千金方》對度量的處理有誤²⁷。

要進一步理解國家刊印和傳佈醫書對閱讀群體影響的範圍和限度，還可以《千金方》兩方與小字本為例。葉德輝在《書林清話》中曾節錄明仿宋本的《脈經》前的宋代公牒：“國子監准監關，准尚書禮部符，准紹聖元年六月二十五日敕，中書省尚書省送到禮部狀。據國子監狀，據翰林醫學本監三學看治任仲言狀，伏睹本先准朝旨，開雕小字《聖惠方》等共五部出賣。並每節鎮各十部，餘州各五部，本處出賣。今有《千金翼方》、《金匱要略方》、王氏《脈經》、《補注本草》、《圖經本草》等五件醫書，日用而不可缺，本監雖見出賣，皆是大字，醫人往往無錢請買，兼外州軍猶不可得。欲乞開小字，重行校對出賣，及降外州軍施行。本部看樣，欲依國子監申請事理施行，伏候指揮。六月二十六日奉聖旨。依鈔如右，牒刊奉行。”²⁸可知宋醫書局曾針對醫人刊刻重要醫書的小字本，但其中僅有《千金翼方》，未見《備急千金要方》。郭秀梅等先生指出：“在林億等校勘出版《千金翼》之後，倍受重視，大有取代《千金方》之勢。也正是由於這種原因，反而增大了《千金方》的珍貴程度，如前所述，非一般士人所能閱覽的。”²⁹但是刊刻《千金翼》的原因，更可能是在徽宗朝整合醫學教育與經典之後，《千金翼方》成爲瘍科的兼習之書，並成爲考試的內容。

但這是否意味著《千金翼方》之後流行更廣？不得而知，但是獨重《千金翼方》的情況卻也並不與當時的閱讀風氣相符。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上記載蔡州道士楊大均，能默誦《素問》、《本草》及兩部《千金方》，“四書不遺一字”³⁰。沈括《夢溪筆談·補筆談》卷三言：“孫思邈《千金方》‘人參湯’言，須用流水煮，止水則不驗。”³¹此方見《備急千金要方》卷一二：“千里流水湯治虛煩不得眠方：半夏、麥門冬、茯苓、酸棗仁、甘草、桂心、黃芩、遠志、萆薢、人參、生薑、秫米。上十二味口父咀，以千里流水一斛煮米，令蟹目沸，揚之萬過，澄清取一鬥煮藥，取二升半，分三服。”³²沈括所讀應爲宋醫書局本的《千金要方》。馬永卿《嫩真子》卷五講其讀《晉史》載裴秀服寒食散飲熱酒，求問名醫，初不信，“後讀《千金方》第二十五卷‘解五石毒’，一切冷食唯酒須令溫，然則《裴秀傳》所謂當飲熱酒，亦非。”³³其所讀應是《千金要方》，但“解五石毒”在卷二十四。另外也有讀《千金翼方》的例證，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下言《千金方》中有記載寒食散之數方³⁴，兩《千金方》中對待五石散的不同態度，是醫史上重要的公案，王奎克先生對此曾有一解釋：“即侯氏黑散和紫石寒食散本來都有礬石，而在前一方中被改爲礬石，後一方中被改爲石硫磺了。是誰改的呢？看來很可能就是孫思邈本人，當然也可能是孫氏以前的人，也未可定。總之，正因爲有‘大大猛毒’的礬石已被改掉，他才心安理得地把這些‘古方’收入

他的書中。”³⁵ 景蜀惠與蕭榮兩位先生最近又有進一步的討論³⁶。從葉夢得的說法來看，他可能只讀過《千金翼方》，而未曾見過《千金要方》，因此未能注意到兩部《千金方》中對寒食散態度的差異。士人閱讀千金兩方的情況多樣，也就是說，並非所有士人都能獲得官刻本，或者說，士人的閱讀選擇並非一定與書籍是否有官刻本相關。

這節試圖展示官方刊刻醫書及其代表的知識取向與書籍的使用者/閱讀者的選擇和閱讀興趣之間的隔閡和差異。官刻本有其傳遞的途徑以及這種途徑代表的傾向性，這種途徑並非只是傳遞，也意味著控制。我們很難確定在此途徑之外，其對閱讀者會造成怎樣的影響。就閱讀者和書籍的使用者自身的選擇而言，在於其所能獲得資源與知識興趣之間的拉扯。也就意味著，我們需要反思官刻本所代表的文化姿態的邊界在哪裏。下節討論“民間刻本”《千金方》所代表的醫學知識的傳遞會進一步展開對此的論述。

三、穿越政治邊界的坊刻本《千金方》

清嘉慶四年（1799）黃丕烈在書肆西山堂發現了宋刻本的《千金方》，其手識文記：“嘉慶四年二月十九日，至昭明巷老屋，遇書友邵鐘琳謂余曰：‘吾兄西山堂中有元板《千金方》，中配明板者，曾送閱乎？’余曰：‘未也。’因到彼閱之，適主人不在，從其火（夥）取歸。共十四冊，內配第六至第十，第十六至第十九，仍缺第二十卷。其餘皆宋刻宋印，非元版也。越日，遣人問其價，需錢二兩四錢。遂如值與之。”此西山堂即苕溪邵氏西山堂，曾刻有《古今說海》、《青樓集》等書。黃丕烈根據其與宋醫書局本的抄本對比，認為這是未經宋臣校改過的古本：“余家舊藏錢述古抄本，云是從宋閣本出者，已自侈為善本。今得宋刻勘之，鮮有一處符合者。初不解其故，後檢《通考》，知晁所見者為《千金方》

三十卷，陳所見者為《千金備急方》三十卷本。其前‘類例’數條，林億等新纂。則知抄本即從宋閣本出，已是經後人增損，原書故與宋刻原本多所不同也。二本非特文義增減，即藥名分兩法制，殊有不合前人之方。”³⁷ 黃丕烈已將所得的《千金方》刻本看作是與宋醫書局刻本不同的“原書”，其實區別於《備急千金要方》的其他早期傳本，是否都更接近孫思邈書的“原貌”是很難確定的。黃丕烈的思維邏輯建立在當時整體的學術認識之上，正如田曉菲先生指出的，這是一種在“求古”與“求真”之間產生的幻覺：“‘求古’和‘求真’意味著早期刻本（也就是說宋代版本）或者早期抄本總是比後來的更好，因為黃丕烈看來，它們能夠更好地反映一部書籍的‘原始面貌’，從而顯示古代作者的‘精神’。黃丕烈校勘的原則的優點在於他校對時非常謹慎，總是記錄下來所有的異文，但是，這種思想的缺點也很明顯，因為拒絕承認手抄本文化中文本的流動性和不穩定性，加強了這樣的幻覺：儘管在文本流傳過程中存在著重大的問題，我們還是可以完美地恢復古人的面貌與精神。”³⁸ 其他的早期抄本與寫本也只是在這個遠離了孫思邈時代流傳的文本之一，但《孫真人千金方》卻逐漸被看作是更接近孫思邈“真意”的“原本”。

黃丕烈將卷六至一〇，卷一六至卷一九改配以元版，卷二〇改補以明版，其嘉慶二十二年的手識文記：“余既收得宋刻殘本《千金方》，久藏篋衍，未暇裝潢也。及後收得元刻全本，知從宋閣本出。而錢述古之久抄以為出自宋閣本者，據此也。前云此配明本，所見未的。後又收得明翻元刻，宋本缺卷，尚可為狗尾之續。因合裝之。”³⁹ 書上有“袁廷禱借觀印”，應是從黃丕烈處借看。另有“汪士鐘藏”、“平陽汪氏藏書印”，應是于黃丕烈處散出之後，歸於汪士鐘（與宋本《忘憂清樂集》情況一樣）。19世紀末為陸心源收藏，陸心源在其《儀顧堂題跋》卷七中進

一步強調了此本更接近唐本的看法：“校以日本覆治平本，不但編次先後迥然不同，即字句方藥，幾於篇鮮同章，章鈔同句。惟與治平本校勘記所稱唐本多合，洵為孫真人之真本，非林憶既校以後刊本可同日而語。”⁴⁰其中更強調了此刊本作爲“原本”與“真本”，其價值超越所有校正以後的刊本。1907年爲日本岩崎彌之助財團購得，存於東京靜嘉堂文庫。

讓我們重新回到《孫真人千金方》書的本身。此本每本葉有界十四行，行二十四字，間或二十五、二十六字。注文小字雙行。白口，雙黑魚尾，左右雙邊。首行題曰：“新雕孫真人千金方”。版心或題“千金方幾”，或題“千金幾”。不記字數，也無刊工姓名。前引黃丕烈、陸心源均以爲此本爲北宋本，馬繼興先生曾根據黃丕烈在《蕘圃藏書題識》的一句注文，即此書遇敦字有關筆，避宋光宗嫌名，認爲此書應是南宋初版刻⁴¹。蘇禮則認爲，新雕本之刊刻應在林校之前，至少在同時，而不會在林校本成書之後，從其書名推測，其祖本可能是唐代晚期至宋初間收入道藏的《千金方》寫本⁴²。小曾戶洋先生根據避諱字與俗字的情況，認爲可能是南宋紹熙年間以後的坊刻本⁴³。後來馬繼興又推翻原有意見，認爲其刊刻年代至少在北宋建國初年到《備急千金要方》正式刊行之間（960-1066）⁴⁴。曾鳳則認爲應該是北宋英宗之前的坊刻本，很可能是刊行醫書局本之前流行的本子⁴⁵。實際現在爭論的焦點在於是否有避“敦”字諱，小曾戶洋指出卷二九第九葉正第七行的“敦”字缺筆，但曾鳳也指出“敦”字有八例未見全部避諱。此本字體風格似乎更接近顏體。或者此本大部分是北宋初年刻本，部分爲南宋紹熙以後補刻。

但此本所根據的底本可能只是流傳在宋代的諸種與宋醫書局本不同的傳本之一。牟巘的《牟氏陵陽集》中收錄了其爲費茂卿所寫的《方書序》：“方術，猶云一方之道也。五方殊分，風

氣攸限，道則一而已。醫之爲道，藥雖出於其手，而方多傳于古人。故修方之家，采之欲博，擇之欲精，而其用之人欲有活法。蓋醫者意也，所以通殊途而會一理也。世率謂孫思邈得龍宮玉函禁方，其事甚怪，及現《千金方》論治積聚爲虛，則取之《雷公藥治》，傷寒則取之仲景、華佗，風眩則取之徐嗣伯，蒸汗則取之張苗、陳廩丘，莫不自有所本焉。況當區宇混一，如江右晉時醫師所述支用存、范祖耀等腳氣八十余條，晉宋時蘇氏所習小兒諸方，皆前所未見。則又取其經驗者用之，它如《崔文行度療散》、《西州續命》之類，亦所不廢其博采而精擇如此。非胸中有活法，酌古今通南北，孰能會於一乎。吳興費茂卿，世醫也。予稔知四十年矣，兼明諸科，博習諸經，而周知南北之俗，安分知足志在濟人。謁方求藥者日踵其門，悉意調護多所全活。暇日博采古今明方類爲若干門條，分臚列無微不載，往往其平日以活法用之而有明效者，蓋非一朝夕之力也。得古《千金方》爲多，茂卿不以自私，將板行於世，使傳之者亦能用之以活。”⁴⁶費茂卿能輯錄古《千金方》之條文于自己的方書中，可知當地應有區別於“現《千金方》”（可能是指醫書局本）的抄本流傳，而這種古今的區分實際說明刊本出現之後的一種價值取向，刊本中所不能見到的內容即是遺失的古代知識，會體現古代作者的“真正”意思。趙彥衛《雲麓漫抄》考證屠蘇時，亦引《千金方》言：“屠蘇之名，不知何義？”⁴⁷郭秀梅等言：“關於屠蘇酒的記載，見《千金方》卷九避溫第二，現傳本已無‘屠蘇之名不知何義’語。”⁴⁸但此說亦不見於《新雕孫真人千金方》。因此《新雕孫真人千金方》所依據的應僅是這些在宋代流傳的《千金方》傳抄本中的一部分，不過其在刊刻之後，流傳與被保存的能力則大大增加了。《新雕孫真人千金方》的傳播史還可以從出土文獻來加以考察。

1908年俄國科茲洛夫（B. K. Kozlov）在內

蒙古黑水城遺址發掘到了大量寫本和印本。其中有六葉《千金方》殘葉（TK166）。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察也在黑水城發現了印本《千金方》的殘葉（KK. II . 0285[b]. iv. m<OR 8212/73 M. 478>），馬伯樂（H. Maspero）在《斯坦因在中亞第三次探險所獲漢文文書》中編號為 No.478。李繼昌先生在 1988 年曾根據孟列夫的提要對其加以介紹，並將其與宋醫書局本對比，認為其梗概並無太大出入，應是 11 世紀至 13 世紀之間的坊

刻本，或者是西夏人根據林憶校正之前的宋刻本為藍本所刻⁴⁹。小曾戶洋認為它排列與《新雕孫真人千金方》比較接近，應是南宋末元初（即 13 世紀中後期的版本）⁵⁰。馬繼興先生則認為俄藏本與英藏本應屬同一刊本，即遼本，時間在 11 世紀至 12 世紀初⁵¹。筆者對比篇次、篇題與方論、方劑順序（見表三、表四），認為確實與《新雕孫真人千金方》比較接近，但其數目字並不用大寫，與英藏本不同。

表三 《千金方》卷一四篇次、篇題的對比

宋醫書局本《備急千金要方》	《新雕孫真人千金方》	俄藏黑水城出土印本	《道藏》本
卷第十四（小腸腑）	孫真人千金方卷第十四	孫真人千金方卷第十四	卷之四十三小腸腑（凡七類至四十五卷止）
小腸腑脈論第一	小腸腑脈論第一	小腸腑脈論第一	小腸腑脈論第一
小腸虛實第二	小腸府虛實第二	小腸虛實第二	小腸虛實第二
舌論第三	舌論第三	舌論第三	舌論第三
風眩第四	風眩方第四	風眩方第四	風眩第四（徐嗣伯方）
風癩第五（狂邪針灸圖訣附）	治瘋癩方第五	瘋癩方第五	風癩第五（附狂邪針灸圖訣）
風虛驚悸第六	心風驚悸方第六	驚悸方第六	風虛驚悸第六
好忘第七	好忘方第七	好忘方第七	好忘第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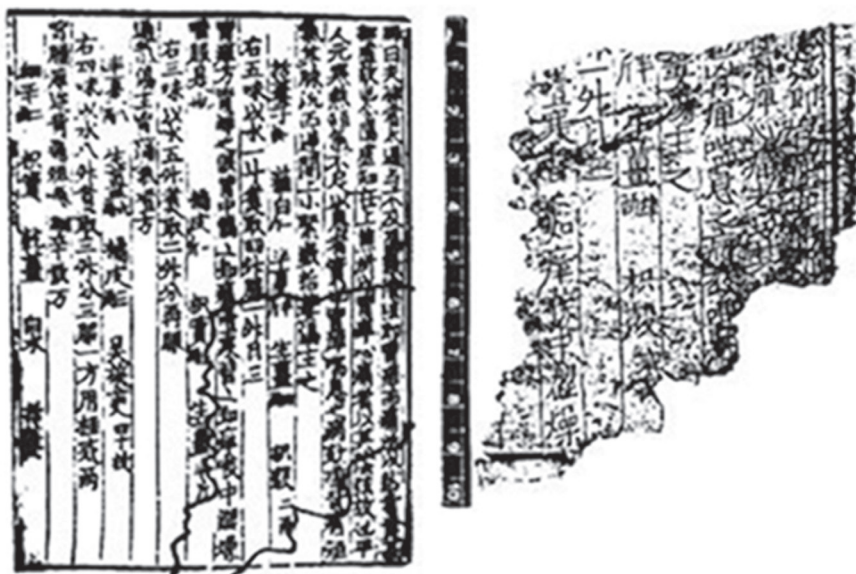


靜嘉堂本、俄藏《新雕孫真人千金方》對比圖⁵⁴

西夏文《音同》正德六年（1132）跋文記載：“今番文字者，乃為祖帝朝搜尋。為欲使繁榮，遂設刻字司。”⁵² 西夏有官方刻字司，另也有坊刻本。白濱先生曾指出西夏版刻的特點：“版心一般在長 15 釐米至 23 釐米，寬 10 釐米至 15 釐米之間。版刻多白口，四周單邊，或雙邊；或上下單邊，左右雙邊。版心中縫有魚尾，也有無魚尾的。上方刻書名，下方刻頁碼。單葉 6-9 行不等，有的用單線分行。版面上還常在字行空隙處雕置梅花、菱花、星花等幾何飾物。但從雕版技術上看都比較粗糙，不規整。”⁵³ 此印本從書體與版式等方面，都不類西夏國內的版刻，此版刻字體更近顏體。如果將其與靜嘉堂本比較，可見其版

式和字體都相當接近，即使不是宋版，也應為覆刻宋本。

小曾戶洋指出，此英藏印本存卷一三“胸痹”第七中“師說”、“栝樓湯”、“胸痹方”之殘句，其排列與靜嘉堂本同，而與宋醫書局本不同。但其所記藥物分量均用繁體中文數位，與靜嘉堂不同，應為同一書的不同版本。也就是說宋本《新雕孫真人千金方》有過翻刻本⁵⁵，可能是元初的刊本，也可能是金刊本。馬繼興認為是遼本⁵⁶。無論這些推測中的哪一個成立，都可以知道《新雕孫真人千金方》在其他的政權和朝代被翻刻，而進一步傳播。



靜嘉堂本、英藏《孫真人千金方》對比圖⁵⁷

史金波先生曾詳細列舉黑水城文獻中保存的宋朝和金朝出版的書籍⁵⁸，可知在西夏存有各政權刊刻的書籍。不論俄、英藏本《千金方》各自來自何處，但可以確定為不同系統的刻本，也說明在西夏國內應有來自不同刊刻系統的《孫真人千金方》在流傳，足以說明此書的流行程度⁵⁹。吳儆《竹洲集》卷十“邕州化外諸國土俗記”嘗記載

大理國賈人至橫山“多市《史記》、《漢書》、《三國志》、《資治通鑒》、《本草》、王叔和《脈訣》、《千金方》等書。”⁶⁰ 醫學書籍是當時各個政權所控制的區域之間書籍流通中重要的組成部分⁶¹，而《千金方》則是被優先選擇的一部書。但在政權之間的書禁，實際上阻止了官刻的《備急千金要方》在不同政權中的流動，原來推動其

傳遞的因素反過來成爲建立邊界的力量。《新雕孫真人千金方》很可能是以商業利益爲目的的刊刻，此動力使其在其他政權需求下不斷跨越政治的邊界。但這樣的刻本是否能比官刻本更爲接近“原本”，大約也只是田曉菲所描述的“幻覺”罷了。同時，現存的刻本類型也絕不能反映出當時所流傳的所有文本類型，但是觀察其差異以及造成差異的文化社會因素，可以提供一種理解文本多樣性的途徑。

四、日本藏《千金方》古抄本與醫書的家傳形態

之前討論校正醫書局的諸種評價時，一個隱含的假設，是在雕版印刷技術出現之後，印本書籍替代了寫本。但是近來的研究有不同的看法，戴仁（Jean-Pierre Drège）先生強調在古代中國，印本對寫本的取代是在明朝，但他也認爲印刷術在宋代社會的城市化和商業化中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⁶²。井上進先生指出在印刷術發明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寫本仍然在廣泛流行，直到明代晚期商業印刷的大量出現，才奠定了印本的優勢地位⁶³。周紹明（Joseph McDermott）先生則將這一時間推至明代中期，從而將宋代到明代中期看作一個印本與抄本並行，印本逐漸取代寫本的時期。但是他也強調，即使是明代商業印刷的盛行也未能完全破裂寫本的知識傳統⁶⁴。即使《千金方》被版刻印刷，在這個時期仍然是寫本占優勢的時代。只是沒有此時期流傳的寫本存世，往往誤導了研究者。但若將目光轉向域外，日本所藏《千金方》抄本會提供進一步討論寫本時代醫書流傳途徑的一種可能。九世紀末藤原佐世撰的《本朝見在書目錄》，其中著錄孫思邈撰《千金方》三十一卷，這應該是日本官府所藏《千金方》寫本。而在官府之外，日本的醫學家族內也收藏有《千金方》的寫本，日本宮內廳書陵部就收藏有日本名醫世家和氣氏家藏《千金方》寫本，此寫

本曾一度失傳，直到天保三年（1832）才又發現卷一，經松本幸彥影摩後題跋，丹波元堅撰序刊行，題名爲《真本千金方》。此寫本首題“千金方第一並序”，下隔四字署“處士孫思邈撰”。其中的題記可以提示其傳授的歷史，現將其按照年代抄錄如下：

建治三年（1277）十一月十三日以家傳秘書寫之畢（同二十六日墨點，同十二月十一日朱點了，同十三日一校畢）。從五位上行權女醫博士和氣朝臣仲景。

正安三年（1301）正月五日讀畢，從五位上行隼人正兼權女醫博士和氣朝臣弘景。……以家說授弘景畢，大膳權大夫。

延慶二年（1309）八月七日讀畢，以秘說授音成畢。

正和四年（1315）四月十九日以家傳秘本於室町宿所寫之畢（同五月五日墨點幹，同八日朱點了）。正五位下行典藥權助和氣朝臣嗣成。

正和五年（1316）正月十一日以家傳秘說授典藥助嗣成畢。

觀應三年（1352）八月七日以家傳秘說授權女醫博士爲成（於是十歲）畢。

另外其中還有“建武五年（1328）正月十一日”、“觀應三年九月二十一日”、“亨德二年（1455）五月十九日”、“康正二年（1456）六月十七日”、“永正元年（1504）仲冬二十日”、“天正三年（1575）三月二日（和末葉明雅）”等題記。

這些題記不只展示了此寫本傳抄的歷史，同時也爲瞭解醫學家族內的知識傳授提供了珍貴的資料，會傳授給家庭男性成員的“家傳秘說”，這些知識是通過家內秘傳的醫書抄本來體現的，似乎在傳授給下一代之前，需要進行重新抄寫與校點的工作，這種知識家傳帶有“授書”的色彩，然後進行“讀”，即誦讀與講疏文義的工作。李建民先生曾指出：“上言醫學傳授的幾個程式是：

受書、誦讀、理解及驗證；醫學固然以經驗為主，實作體驗尤不可少，但典籍本身也是醫術經驗的呈現，而誦讀古人的文本心法則是習醫的必經過程。……典籍在此有着‘社群規範性的功能’（communally regulative function）。也就是說，醫學文本具有建立師徒系譜、區別我群與他群的作用。”⁶⁵寫本傳授在家傳醫學區別我群與他群的意義上，也具有重要作用。印刷技術出現之後，並不是寫本立即就被印本取代，黃休復《茅亭客話》卷一〇所記的宋代傭書人杜鼎，往往被論者引用證明宋代寫本流傳的情況，他所抄寫的書中就包括《千金方》⁶⁶。在這個寫本和印本並行的時代，寫本和印本在不同的社會情境下可以互相轉化。但在印本書出現之後，抄寫可能呈現出一種文化姿態，就是與秘傳更緊密地結合起來。

醫學家傳並不是日本獨有的現象，那麼日本醫學家族內《千金方》傳遞的情況，不僅能作為推測唐宋時期《千金方》在醫學家族內傳遞的一個旁證。同時這件《千金方》抄本在家族內部閱讀和傳遞時，雕版印刷技術已逐漸在日本發展⁶⁷，但並非意味著知識更為開放的傳遞。相反，印刷很可能觸發了一種更為強調自身知識來源和身份獨特性的秘傳方式，這種秘傳方式以一種授受抄本的授書儀式展現出來。

五、餘論：印刷、國家和書籍的世界

在文章一開頭曾指出，無論是校正醫書局的讚賞者還是批評者，都存在一個基本的假設，即一本醫書的世界，在經過校正醫書局校勘和刊布之後，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而對這種影響力的估量都來自於對印刷技術和國家力量的“想象”。

正如前文所說，我們開始反思宋代印刷帶來了怎樣的變化，而非簡單假設印刷和國家力量的結合帶來了“革命性”的結果。知識流傳乃至知識本身的變化都與印刷技術的變化緊密地結合起

來，但無論知識的歷史，還是印刷術的歷史都沒辦法獨立於當時的文化與社會，而被單獨地敘述。但當更多的文化社會因素被納入到印刷術與知識的歷史敘述中來時，原有知識文本傳播的假設也需要被重新省視。前文已經指出，近來的研究強調宋代雖然雕版印刷技術發展，但仍然是寫本印本並存的時代，寫本甚至可能更有優勢。研究宋代書史的學者回應這樣的論斷⁶⁸，提出“第一次雕版印刷革命”的說法，試圖廓清此時期印刷技術造成的影響和變革。賈晉珠（Lucia Chia）和 Susan Cherniack 都強調這時期的印本對精英閱讀群體產生的影響⁶⁹。魏希德（Hilde de Weerd）則強調印刷技術在邸報中的運用，說明這個時期印刷的影響在於在官僚系統中傳遞資訊，從而重塑了宋代的政治圖景⁷⁰。艾媿婕（TJ Hinrichs）將北宋下頒的醫書看作一種國家治理的途徑⁷¹。雖然我們依然強調印刷術對社會文化諸層面的影響，但這些研究已經為印刷技術所造成的影響提供了種種限定和反思，同時重新把一些關鍵性的因素放到討論的核心，比如國家、精英。但也正如艾朗諾（Ronald Egan）先生所說，我們尚無法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即印本如何改變了這個時代的文本以及閱讀、書寫和學習的方式⁷²。

於是我們要再思考：在這個印本並不能完全取代寫本的文化時期，它與寫本各自在知識傳播中扮演怎樣的角色，它們之間的區別在這個時期的文化中有怎樣的象徵意義？印本與寫本之間的區別重新賦予了宋明之間每一種書籍不同的“面相”以及研究的空間。更大的困難是，我們如何通過現有保存的下來的印本們，去想象這些書籍在一個抄本和印本並存時代的存在形態，特別是當我們遭遇到一個基本的困境：幾乎所有的同時代抄本和相當部分的印本都沒有保存下來。對醫學史而言，這個問題非常重要。因為在宋代醫學變化的敘述中，醫學書籍的官方刊刻扮演著一個重要的中介位置，它連接其了北宋前期宮廷對醫

學的重視與之後的士人習醫風氣，也被認為是推動醫學知識群體身份變化的動力之一。隨之而來的問題是：我們如何在一種更為複雜的敘述中重新思考校正醫書局及其刊印書籍的意義。《千金方》的例證顯然不能提供所有的答案，但其中也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綫索。

宋代對前代醫書的校勘，帶來了複雜的變化。“儒臣”話語憑藉國家力量的介入更給這種變化賦予多重的意義。因此刊刻的“固定性”在這裡凸現出來，它保證了對這種新著作權威的彰顯，但流動性也許並不是其優先的考慮。印本和抄本在這個時代並存，並相互轉化，兩者的對立並非是一種實際的“不可共存”，而是塑造出兩種象徵性的知識傳遞方式。前文的研究已經展示了，

面對印本的出現，抄本也不再像中古時期那樣代表一種知識傳播更為開放的姿態，它本身中帶有“禁秘”與“師授”的特點重新凸現出來，成爲一種文化上的姿態。校正醫書局印本方書的整理形式也帶來一種文化姿態，中古以來單驗方相授受的風氣中，方似乎是流動的主體，並不完全受方書的限制，“整本”的體例嚴整的方書正在試圖成爲知識傳遞的主要載體⁷³，甚至可以說，它試圖影響的不僅是傳遞知識方式，也是著述和積累知識的方式。但是，這種整理後的方書形式卻也並不能完全阻止在醫學實踐和轉抄中，“方”對“書”的形態的突破，只是這種突破呈現了新的形式。比如陳言在《三因極一病證方論》中引用《千金方》：

表四 《備急千金要方》與《三因極一病證方論》“溫胃湯”方對比

《備急千金要方》卷第十六	《三因極一病證方論》卷一一
溫胃湯，主胃氣不平，時脹咳，不能食方。 附子、當歸、厚樸、人參、橘皮、芍藥、甘草（各一兩）、乾薑（五分）、蜀椒（三合）。 右九味侷咀，以水九升煮取三升，分三服 ⁷⁴ 。	《千金》溫胃湯 治憂思聚結，脾肺氣凝，陽不能正，大腸與胃氣不平，脹滿沖咳，食不得下，脈虛而緊澀。 附子（炮去皮臍）當歸 厚朴（去皮生用）人參 橘皮 白芍藥 甘草（炙，各一兩）乾薑（一兩一分）川椒（炒出汗，去合口者，三分） 上為銼散。每服四大錢，水二盞，煎七分，去滓，食前服。 ⁷⁵

兩相對比，顯然已經不止是底本差異造成的，而是撰著者對“方”本身的修改。但在這樣一種轉抄和保存的過程當中，引述來源所代表的文化姿態卻已不同。抄本時代引述方書，代表著保存的意義，抄寫的過程中知識形態不斷在改變，不過，知識的權威卻在於對古方的保存。在印本的時代，抄寫者似乎已假設讀者會以原方對比，凸顯的是知識的創造。於是，抄本和印本所造成的世界，並非是文化姿態和實際狀況的截然兩分，而是一種交錯的狀況。

這些文化的姿態要成爲“文化實態”，仍然要經過漫長的歷程，在這個時代，其實現的程度取決於多種因素。比如，國家刊刻的書籍並非只是知識傳遞也是控制，受其下頒或控制的路徑的影響。控制典型的例證就是書禁，由於政權之間對立，在傳遞中所設立的種種阻礙，這是校正醫書局影響力的“限度”。因此我們需要觀察在同一時期內流通的不同印本意味著怎樣的文化現象？它們對知識的傳遞起到了怎樣不同的作用？國家刊印的醫學書籍是否就能取代了所有其他的

知識傳統？這在很多研究宋代醫籍書志學的著作中，已經成爲分析與討論的基礎。但在“治民”的地方官員眼中，醫藥知識的實踐作用更被重視，他們的使用方式也許會與中央政府刊刻不同醫籍的意圖有所區別。將醫學書籍作爲自身閱讀興趣範圍的士大夫，其閱讀的範圍也不限於官版的書籍，他們也許會使用更多的文化與經濟資源去獲得更爲少見的刊本和手抄本。相反，在官版之外的知識傳統中，很可能是因爲其中的一種文本通過商業利益的驅動，不斷跨越政治邊界，逐漸掩蓋和取代了其他文本。同時通過與官本的區別，逐漸在一個找尋“古本”和“原本”的知識歷程中成爲最被看重的知識文本，只是，那已是另一段書籍的歷史。

誌 謝

本文曾提交“醫家與史家的對話—中醫學術知識的歷史傳承與變革”國際學術研討會（臺中：中國醫藥大學，2013年3月9-11日），得與會諸位先生的意見，後又得評審人的意見，在此一併致謝。

參考文獻

1. Asaf Goldschmidt,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Song Dynasty, 960-1200*, Oxford: Routledge Press, 2010.
2. 《合璧本玉海》，臺北：中文出版社，1977年，1249頁。
3. 《直齋書錄解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387頁
4. 廖育群、傅芳、鄭金生《中國科學技術史·醫學卷》，北京：科學出版社，1998年，300頁。參見梁峻《略論宋代的醫藥文獻工作》，《北京中醫藥大學學報》1999年第1期，25-27頁；
5. 范昕、趙桂新《宋代校正醫書局的產生、成就及其影響》，《中醫藥學報》1999年第2期，8-9頁；蔡永敏、李玉華《宋代文化與古籍整理研究》，《中華醫史雜誌》1999年第4期，223-226頁；汝企和《北宋官府對醫書的校理》，《北京師範大學學報》2006年第2期，141-145頁；Asaf Goldschmidt,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Northern Song Dynasty, 960-1127*.
5. 此段文字見於謝觀《中國醫學源流論》（福建科學技術出版社，2003年，33頁）和呂思勉《醫籍知津》（《呂思勉文化思想史九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20頁），近來以上兩本著作的“作者權”問題成爲了爭議的焦點，見祖述憲《〈中國醫學源流論〉真正的著者是誰？——史學家呂思勉的〈醫籍知津〉顯露真相》，《中華讀書報》，2013年3月20日第13版。
6. 田曉菲《塵几錄——陶淵明與手抄本文化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9頁。近來麥大維（David McMullen）先生對此有反思性的評述，見David McMullen, “Boats Moored and Unmoored: Reflections on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 of Gao Shi’s Vers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73-1, 2013, pp. 83-145.
7. 郭霽春主編《黃帝內經素問校注》，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2年，11-12頁。
8. 蕭魯陽點校《雞肋篇》，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115頁。
9. 黃龍祥《試論宋代校正醫書局私改醫書之弊》，《中國中醫基礎醫學雜誌》1997年第4期，43頁；參見黃幼民、黃龍祥《宋代校正醫書局改編〈千金要方〉的新證據》，《中華醫史雜誌》2001年第2期，78-80頁。
10. 范家偉《北宋館閣官、儒臣與校正醫書局》，《漢學研究》第29卷第3期，89-124頁。
11. 范家偉《北宋監本醫書與習醫方式初論》，“中

- 古方書：醫學史、書籍史和社會史的解讀”國際研討會，2011年9月18日，北京大學。
12. 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55年，553頁。
 13. 宮下三郎《宋版〈備急千金要方〉について》，《米澤善本の研究と解題》，同志社東方文化講座文研會，1958年。
 14. 嚴紹盪《日藏漢籍善本書錄》，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924頁。
 15. 嚴紹盪《日藏漢籍善本書錄》，927-928頁。
 16. 李景榮《備急千金要方校釋》，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7年，15-17頁。標點略改。
 17. 曾鳳《〈千金要方〉備急本與新雕本方劑文獻異同考》，北京中醫藥大學博士論文，2006年。
 18. 參見章碧明《〈太平聖惠方〉及部分引用文獻的研究》，中國中醫科學院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43-45頁。
 19. 《宋大詔令集》卷二一九，臺北：鼎文書局，1972年，842頁。
 20. 李景榮《備急千金要方校釋》，17頁。標點略改。
 21. 蔡襄《端明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90冊，15頁。
 22. 《千金寶要》，叢書集成初編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1頁。
 23. 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723頁。
 24. 俞劍華標點注釋《宣和畫譜》，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64年，191頁。哈佛大學在2009年11月7日舉行關於郭熙《早春圖》的研討會（*Early Spring <1072>: Multiple Views*），其中的文章有很多涉及到郭熙。
 25. 參見蘇禮《備急濟眾的〈千金寶要〉》，《上海中醫藥雜誌》1986年第5期；李玉清、盧秋霞、王振國《從〈千金寶要〉看宋代文人撰集醫書的思路》，《國醫論壇》2003年第6期，44-45頁；李玉清《郭思與〈千金要方〉》，《江西中醫學院學報》2007年第2期，37-38頁。
 26. 典型的例子包括《幼幼新書》卷第五“初生有病”凡十七門“初生臍腫濕”第十六“白石脂散方”。
 27. 《醫經正本書》“辯本草千金方權量度”第七，“叢書集成初編”本，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7頁。
 28. 葉德輝《書林清話》，長沙：嶽麓書院，2000年，124頁。
 29. 郭秀梅、岡田研幸、加藤久幸《〈千金方〉唐宋流傳拾零》，37頁。
 30. 葉夢得《避暑錄話》，《叢書集成初編》本，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20頁。
 31. 胡道靜《夢溪筆談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1025頁。
 32. 但此條不見於《新雕孫真人千金方》，見《孫真人千金方》，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6年，188頁。
 33. 馬永卿《嫩真子》，《叢書集成初編》本，67頁。
 34. 葉夢得《避暑錄話》，63-64頁。
 35. 王奎克《“五石散”新考》，《科技史文集》第11輯，上海科技出版社，此據趙匡華主編《中國古代化學史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87頁。
 36. 景蜀慧、尚榮《中古服散的成因與傳承——從皇甫謐到孫思邈》，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13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337-368頁。
 37. 屠友祥校注《蕘園藏書題識》，上海遠東出版社，1999年，266頁。
 38. 田曉菲《塵几錄——陶淵明與手抄本文化研究》，16-17頁。
 39. 屠友祥校注《蕘園藏書題識》，267頁。
 40. 陸心源《儀顧堂題跋》，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
 41. 馬繼興《備急千金要方》，北京：人民衛生出

- 版社，1955年，86頁。
42. 蘇禮《〈新雕孫真人千金方〉考略》，《中華醫史雜誌》1995年第3期，177頁。
 43. 小曾戶洋《中国古典医学と日本——書誌と傳承》，東京：塙書房，1996年，454-455頁。
 44. 馬繼興《日、英、俄藏〈孫真人千金方〉珍希文獻及其重要意義》，《敦煌吐魯番研究》第4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285-312頁；此據馬繼興《出土亡佚古醫研究》，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2005年，144-151頁。
 45. 曾鳳《〈千金要方〉備急本與新雕本方劑文獻異同考》，北京中醫藥大學博士論文，2006年，21-25頁。
 46. 牟巖《牟氏陵陽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88冊，113-114頁。
 47. 傅根清點校《雲麓漫鈔》，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138頁。
 48. 郭秀梅、岡田研幸、加藤久幸《〈千金方〉唐宋流傳拾零》，37頁。
 49. 李繼昌《列寧格勒藏〈孫真人千金方〉殘卷考索》，《敦煌學輯刊》1988年第1、2期，119-122頁。
 50. 小曾戶洋《中国古典医学と日本——書誌と傳承》，460頁。
 51. 馬繼興《黑城出土的兩種〈孫真人千金方〉殘書》，《中醫藥文獻研究論叢》，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96年，1-9頁；又《日、英、俄藏〈孫真人千金方〉珍希文獻及其重要意義》，此據馬繼興《出土亡佚古醫研究》，156-157頁。
 52. 史金波、黃振華《西夏文字典〈音同〉序跋考釋》，《西夏文史論叢》，寧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
 53. 白濱《西夏雕版印刷初探》，《文獻》1996年第4期，174頁。
 54. 圖版引自真柳誠、小曾戶洋《宋改を経ない〈千金方〉の古版本二種》，《漢方の臨床》第44卷第12号1997年，1514-1516頁
 55. 小曾戶洋《黑城出土馬斯伯樂文書：No.478》，《日本醫史雜誌》第33卷第2號，1987年，75-88頁。此據趙有臣譯《哈拉浩特出土之馬伯樂文書第四七八號——未宋改〈千金方〉有元復刻本》，《醫史文獻理論叢刊》1988年第2期，7頁。
 56. 馬繼興《出土亡佚古醫研究》，154-156頁。
 57. 圖版引自真柳誠、小曾戶洋《宋改を経ない〈千金方〉の古版本二種》。
 58. 史金波《西夏社會》，上海人民出版社，497頁。
 59. 近來邱志誠認為中國藏黑水城 F14: W8 號漢文文書為元刻本《重刊孫真人備急千金要方》殘頁，見《黑水城文書中發現又一版本的〈千金要方〉——新刊中國藏黑水城 F14: W8 號漢文文書考釋》，《首都師範大學學報》2012年第1期，114-122頁。
 60. 吳徹《竹洲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42冊，256頁。
 61. 兩宋時期書籍流通與書禁請參考 Hilde de Weerdt, “What did *Su Che* see in the North? Publishing Regulation, State Security,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Song China”, *T'oung Pao*, 92, pp. 466-493. 劉浦江《文化的邊界——兩宋與遼金之間的書禁與書籍流通》，張希清、田浩、黃寬重、于建設主編《10-13世紀中國文化的碰撞與融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38-163頁；孔凡禮《南宋著述入金考》，《文史》2007年第3輯，155-170頁。
 62. Jean-Pierre Drège, “Des effets de l'imprimerie en Chine sous la dynastie des song”, *Journal Asiatique*, 282-2, 1994, pp. 409-442.
 63. 井上進《中国出版文化史——書物世界と知の風景》，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02年。书评請參考 Cynthia J. Brokaw, “Publishing, Society

- and Culture in Pre-modern China: The Evolution of Print Cultu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1, 2005, pp. 135-165.
64. Joseph McDermott, “The Ascendance of the Imprint in China”, Cyhthia Brokaw and Kai-wing Chow eds., *Prints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California Press, 2005, pp. 55-106.
65. 李建民《中國醫學史研究的新視野》，《新史學》第15卷第3期，2004年，203-225頁，此據李建民《生命史學——從醫療看中國歷史》，臺北：三民書局，2005年，6-9頁。中國古代醫學的傳授請參見 Nathan Sivin, “Text and experience in classical Chinese medicine”, Don Bates eds., *Knowledge and the Scholarly Medicine Traditions*,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77-204. 李建民《中國古代“禁方”考論》，《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8本第1分，1997年，117-166頁；又《中國醫學史における核心問題》，《內經》第151號，2003年，16-36頁；又《禁方書、聖人與正典》，《讀書》2003年第8期，64-70頁。
66. 黃休復《茅亭客話》，《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42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年，962-963頁。
67. 木宮泰彥《日本古印刷文化研究》，東京：富山房，1932年。
68. 近來宮紀子對蒙元時代書籍的研究使得我們有機會不再將宋與明看作對立的時代，而關注兩者之間的連續性與變化是如何產生的，見《モ
ンゴル時代の出版文化》，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06年。
69. Susan Cherniack, “Book Culture and Textual Transmission in Sung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4-1, 1994, pp. 5-125. Lucille Chia, *Printing for Profit: 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ianyang, Fujian(11th–17th Centuries)*, Cambridg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2, p. 145.
70. Hilde deWeerd, “Byways in the Imperial Chinese Information Order: The Dissemination and Commercial Publication of State Document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6-1, 2006, pp. 145–188.
71. TJ Hinrichs, “Governance through Medical Texts and the Role of Print”, Lucille Chia and Hilde De Weerd eds., *Knowledge and Text Production in an Age of Print: China, 900-1400*, Leiden: Brill, 2010, pp.217-238.
72. Ronald Egan, “To Court Grains of Sand on the Ocean Floor: Changing Perceptions of Books and Learning in the Song Dynasty”, Lucille Chia and Hilde De Weerd, *Knowledge and Text Production in an Age of Print: China, 900-1400*, pp. 33-62.
73. 倪健 (Christopher M. B. Nugent) 在研究唐宋詩歌傳遞方式的變化時也觀察到了類似的現象，見 “Literary Collections in Tang Dynasty China”, *T'oung Pao*, 93, 2007, pp. 1-52。
74. 《備急千金藥方》，359頁。
75. 《三因極一病證方論》，北京：華夏出版社，147頁。

Medical Recipes between Manuscript and Print: the Book History of Essential Prescriptions Worth a Thousand in Gold in Song Dynasty

Hao Chen*

School of Histor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This article offers a case study of the producing, printing and distributing of an important medical book, *Essential Prescriptions Worth a Thousand in Gold*, in Song dynasty. It challenges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print books produced by Medical Book Bureau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dominated and changed the whole map of medical books in 11th century by presenting a historical picture that *Essential Prescriptions Worth a Thousand in Gold* had various material forms, manuscripts, woodblock print books, and carved on stones, and produced by various groups, central government, local officers, physicians, literati with medical interests and commercial printers. By studying on the materiality of *Essential Prescriptions Worth a Thousand in Gold*, the article reveals the complicity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edical knowledge and social authority.

Key words: Medical recipes, manuscript, print, book history

*Correspondence to: Hao Chen, School of Histor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No. 59 Zhongguancun St., Haidian Dist., Beijing, 100872, P.R. China, E-mail: peterrc@163.com

